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创新意蕴

胡守勇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03)

[摘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创新成果,是建构中国理论、传播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展示中国道义的光辉典范,蕴含着深厚的创新意蕴。在理论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发展了世界历史理论、共同体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在话语上树立了传播中国声音的新典范,讲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和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在实践上开拓了完善全球治理的新路径,主张推进治理理念共识、拓展多边合作机制、强化全球治理制度保障;在伦理上彰显了国际道义力量的新优势,具有整合各国共同利益的大格局、贯通人类永续发展的大视野和践行正确义利观的大情怀。深刻领会这些创新意蕴,对于全面准确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论创新; 中国声音; 国际道义; 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21)05-0010-06

DOI:10.13967/j.cnki.nhxb.2021.0075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期,在对外交往和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实践基础上形成的重要思想,深入思考和回答了“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历史之问和时代课题,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守正创新建构中国理论、传播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展示中国道义的光辉典范。深刻领会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创新意蕴,对于全面准确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深入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一 理论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一般规律,自19世纪40年代诞生以来,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极大地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习近平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制高点。”^[1]时代是思想之母,科学理论需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相对于经典作家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当下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力量对比、世界经济发展和科技水平、文明交流交融交锋程度、国际社会的安全状况,地球生态环境质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方面甚至超出了经典作家的预见。世界正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面对全球治理体系中出现的结构性、系统性问题,人类在新的十字路口应该何去何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如何确保,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如何实现,等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没有明确的答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坚定的理想信念、高超的政治智慧、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强烈的使命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直面全球治理的困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百年大党的国际体系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大同”情怀发扬光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一) 发展了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提出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构成。世界历史理论认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交往的不断扩大,人类必将冲破地域和民族的局限而走向统一和融合。世界历史将首先进入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但这只是一个阶段性存在,随着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精神文明极度发达时代的到来,世界历史最终必将走向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相对于经典作家当时的时代,当前国际体系中除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外,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世界各国实质上已经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场体现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收稿日期] 2021-04-06

[作者简介] 胡守勇(1975—),男,湖北利川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辑的统一,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从继承关系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历史过渡性特征,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美好的描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世界历史理论的大框架下,敏锐把握世界格局变动的趋势,立足全球治理的现实困境,提出了具有操作性的中国方案,旨在维护世界历史向正确方向发展的全局。从实践主体看,世界历史理论主要把无产阶级作为世界历史的革命性力量,主张无产阶级通过斗争消灭资产阶级,从而走向社会主义世界历史。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基于当下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实际,将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主题拓展到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和世界人民。从推进方式看,相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维护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主义协调机制,强调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改变传统的革命和斗争手段,提倡发展的包容性与国际交往的合作共赢。

(二)发展了共同体理论

“共同体”是马克思把握人类历史的重要范畴,他将共同体分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抽象的或虚幻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三个历史阶段,真正的共同体存在于由“自由人联合体”组成的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从“虚幻的共同体”走向“真正的共同体”只能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完成,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渡期中如何最大限度地维护人类的根本利益,经典作家没有给予现成的答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立足于全球治理的逻辑问题和现实问题,着眼于从“虚假共同体”到“真正共同体”跨度期内,如何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和共同命运提出的行动方案。从理论上讲,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守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基本立场和发展方向,是对其基本原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合乎逻辑的运用、延伸和发展,体现了对人类发展“新的十字路口”的价值关切、利益关切和命运关切,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具体化。从实践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找到了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背景下世界各国可以对话和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是“真正共同体”远大理想与国际体系现实的最佳结合点,彰显了统筹国内与国际、继承与发展、守正与创新、目的与手段、战略与策略相统一的实践品质。从效应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在国际社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并在相关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国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实践中得到体现,必将对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现行国际体系下实现“每个人

的自由发展”目标的务实安排和理论创新,为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赋予了新意涵。

(三)发展了国际关系理论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和殖民统治深刻批判,以及未来理想社会美好描述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于看待国际关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总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自诞生以来一直与时代同步伐,与国际关系实践相呼应,既有时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民族主义问题、殖民地问题等传统议题的不断深化、拓展和丰富,也有国际体系转型、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新议题的不断被提出、关注和阐释^[2]。当下的国际关系格局正处于深度重塑阶段,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威胁,全球经济、文化的深度交融使南北发展问题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存的时代如何协调冲突、化解矛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没有现成答案。习近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基础,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既是对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超越,还弥补了经典作家“关于国家消亡前各种位阶的国家如何自处并发展问题上的不足”^[3],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推进人类政治文明向前发展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二 话语上:树立了传播中国声音的新典范

建党百年的历史充分证明,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成同国家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越来越具有紧迫性。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4]^[333]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具有自主性、原创性、时代性的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第一次针对全球治理发出的中国声音,先后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彰显了中国话语的国际魅力,树立了传播中国声音的新典范。

(一)讲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的历史文化渊源。习近平在国内外各种场合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时,很好地将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对接,让国际社会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维方式、政治哲学和天下情怀的了解中理解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意。一是讲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和”文化基因。习近平在多种国内外的公开场合中,反复解读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和”文化基

因,讴歌其蕴含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向善的道德观”^{[5]106-107}。中华民族将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代代相传,深知“国虽大,好战必亡”的哲理。在几千年的对外交往中,主要是搞经济和人文交流,从不搞侵略扩张。在对这些故事的阐述中,消除了部分认为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构建自身势力范围的杂音、误会或偏见。二是讲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的“不搞扩张”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场合多次讲述中国历史上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下西洋的故事,认为“这些开拓事业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使用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4]507}。用铁一样的事实告诉国际社会“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6]265}。通过对中国没有搞扩张文化传统的讲述,主动回应国际社会一些对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意的质疑和误解。三是讲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沿袭的“天下大同”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来怀有“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推崇“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强调各民族间要情同手足、共同发展。从先秦到现代,“天下大同”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天下”观发展为“全球”观,“天下大同”情怀转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和情怀。

(二)讲好了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对于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声音的理解和认同至关重要。习近平在国内外场合多次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对外交往理念,并将与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结合起来,在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的同时,更好地传播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一是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带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初心和使命反映了党治国理政的本色和对待世界的基本态度,是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和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7]436}将党的初心和使命对外讲述,阐明了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是为了人类进步事业和世界的和平发展。二是将中国共产党的新发展理念带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习近平多次在不同国际场合针

对当前世界面临的发展困局倡导新发展理念,实现了国内经济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贯通。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实现各国经济社会协同进步,解决发展不平衡带来的问题,缩小发展差距,促进共同繁荣。”^{[7]441}在全球发展中,要更多地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及推动“共商共建共享”进行“一带一路”建设,则是中国共产党“先富带后富”的当代世界版本^[8]。三是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思想带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逐步探索出来的创新成果,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理论武器。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思想引入到全球治理中,开辟了中国理论的新境界。习近平在2018年4月8日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指出:“中国正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五个方面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容。”^[9]他还多次在不同场合,从经济层面的共同发展、政治层面的伙伴关系、文化层面的文明交流、社会层面的安全格局、生态层面的生态建设五个维度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行动路径,成功地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带入到解决全球问题的行动方案中。

(三)讲好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指引下,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两个奇迹”。从国际比较来看,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蒸蒸日上,给国际上怀有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心态的一些人带来了压力。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基本立场和政策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习近平在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时,特别重视将其与中国一贯坚持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对外政策理念结合起来,增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亲和力。一是阐明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的根本需求。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但自鸦片战争以来,饱受着列强的侵略和凌辱,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彻底摆脱被霸凌的局面,中国人民对战争的痛苦和创伤刻骨铭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6]247}。习近平多次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涉及中国的根本利益,“只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同世界各国一道维护世界和平,中国

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才能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6]266}。二是说明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提出并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和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不会威胁谁,都不会颠覆现行国际体系,都不会谋求建立势力范围。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7]194}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保持在30%以上^{[4]48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依靠制度优势,很快控制住疫情,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在疫情防控中,中国向世界各国提供了大量的人员、物资和疫苗等方面的援助,成为全球应对疫情引发经济社会风险的重要力量。三是表明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基本态度。习近平指出,中国有意愿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通过自身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欢迎各国“搭便车”,实现“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目标,中国将“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同时“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7]436},主张国际社会应形成多元自主的发展模式。

三 实践上:开拓了完善全球治理的新路径

在既有国际体系下,国际交往总是或明或暗地被现实主义支配着,“国际关系总是被描述为一个适用丛林法则的世界,而理想主义,特别是理性的而非意识形态支配下的理想主义却极为边缘化”^[10]。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顺应了历史潮流和时代要求,不仅可以为陷入僵局的国际热点、难点问题以及各类国际政治纷争提供解决方案,而且可以为那些困扰人类永续发展、世界持久和平的症结提供解决思路^[12]。

(一) 推进治理理念共识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治理理念的共识是完善全球治理的根本前提。习近平就推进治理理念共识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找准了全球治理问题的根本症结之所在。一是用普遍安全理念引领全球安全格局。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安全问题呈现跨领域、跨国界、跨区域的新形势下,习近平多次强调世界上已经不存在“安全孤岛”,全球安全格局的构建必须以普遍安全的理念力引领。应倡导“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

集团对抗,反对以牺牲别国安全换取自身绝对安全的做法,实现普遍安全。”^{[7]441} 二是用共赢理念引领国际开放合作。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是提高国际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球治理质量和推进文明进步的重要条件。然而,在现行国际体系下,无论是制度创设还是机制运行,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客观上是一种非对称的状态。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这种交往格局不可能持久。习近平指出,应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拒绝自私自利、短视封闭的狭隘政策,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7]441} 中国已经与80多个国家建立了以发展共同利益为准则,以促进互利共赢为目标,以国际合作为路径的各种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13],树立了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典范。三是用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引领文明互动。思想决定行动。冷战思维和既有的意识形态偏见是完善全球治理,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障碍。必须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偏见,倡导“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7]441}

(二) 拓展多边合作机制

多边合作机制成员国数量多、牵涉领域广、区域跨度大、交叉重叠深,对促进全球均衡发展、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影响,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其沿线就包括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亚信会议(CICA)、亚欧会议(ASEM)、上海合作组织(SCO)、亚洲合作对话(ACD)、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这些合作机制使不同区域、不同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生态等方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凝聚共识、扩大合作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指出,拓展多边合作机制是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要创新多边合作模式,“构建起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建设性伙伴关系”^{[7]439}。要拓展国际合作伙伴网络,“强化对观察员国、对话伙伴等地区国家交流合作,密切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伙伴关系,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开展对话”^{[7]443} 不断增强多边机制的整合功能、不断扩大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为推动化解热点问题、完善全球治理作出贡献。

(三) 强化全球治理制度保障

制度是管根本、管长远的东西。以规则为基础加强全球治理是实现全球稳定的必要前提。在人类

命运共同体视野下,强化全球治理的制度保障,包括三个层面的意涵。首先,要变革制度创设规则。习近平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参与。我们应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7]435}要逐步改变由少数国家定规则,大多数国家守规则的既有传统,切实增强国际社会大家庭成员中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体现国家社会共同的声音。其次,要遵循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在长期的国际交往实践中形成的,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以这些基本准则为基础,在渐进性变革中逐步实现。习近平指出:“现行国际秩序并不完美,但只要它以规则为基础,以公平为导向,以共赢为目标,就不能随意被舍弃,更容不得推倒重来。”^{[7]447}从国际法治现状看,绝大部分问题不在于制度本身的良、恶,而在于制度经常不被遵守,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存在“搞实用主义、双重标准,合则用、不合则弃”^{[7]459}的问题。最后,要完善全球规则的实施机制。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国际规则的有效实施是全球善治的基本途径。要完善规则实施机制,铲除规则面前“谁的胳膊粗、气力大就说了算”的顽瘴痼疾。

四 伦理上:彰显了国际道义力量的新优势

马克思曾在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指出:“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14]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天下一家亲”“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等理念,在完善全球治理中具有更大的格局和更强的包容性,彰显了国际道义力量的新优势。

(一)整合各国共同利益的大格局

全球面临和平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突出人类共同利益的整合和凝聚功能。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该怎么办?”的时代之问,无论是现有国际关系理论还是实际发挥作用的国际关系规则都难以给出正确回答。国际交往中的丛林法则、零和博弈、唯利是图的“套路”导致的结果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利益的更加失衡,少部分人越来越富、大部分人越来越穷,越来越与国际道义背道而驰。人类命运共同体摒弃了自我中心主义的弊端,确立了适应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关系性思维,有效切中了全世界人民关切的问题,体现了整合各国共同利益的大格局。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代表了全球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是立于中国伦理文明基础之上为当今世界开出

的伦理良方,有利于树立中国“有道”“行道”的良好形象和结成更加广泛的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15],能为整合各国利益夯实群众基础。另一方面,相对于关于全球治理的各种观点,人类命运共同体切中了人类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大本大源问题,涉及全球伦理的整体架构、当代国际关系伦理的内在要义和人类伦理文明的发展趋势等事关人类生存发展的关键性、枢纽性和决定性问题^[16],为结束零和思维、抛弃利益对抗、推进合作共赢夯实了伦理基础,凸显了整合各国共同利益的大格局。

(二)贯通人类永续发展的大视野

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突出了贯通人类永续发展的大视野,“需要一代又一代接力跑才能实现”^{[4]548}。一要呵护好地球家园这个物质载体。习近平指出:“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终将伤及人类。”^{[5]421-422}国际社会要牢固树立敬畏自然,珍爱地球的意识,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加强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打造清洁美丽的地球家园。二要协调好生态责任这个关键环节。全球生态治理问题日益成为制约人类永续发展的突出问题。在现行国际体系下,生态成本和污染问题呈现出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的趋势,而发展中国家又面临着生态责任约束和摆脱贫困必要生态成本之间的冲突。协调好国际生态责任成为全球生态治理的关键环节。习近平强调,应该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应该照顾到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改善生活质量的努力。三要解答好代际公平这个伦理命题。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17]。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时性”的代际连续体,维护代际公平正义、促进代际均衡发展成为一个首要的伦理命题,因为“人类社会的目的应当是实现、保护所有世代的福利和幸福,这样就有必要让地球的生命维持体系、生态学的过程、环境条件、人类生存和幸福的重要文化资源、健康舒适的人类环境等继续持续下去”^[18]。

(三)践行正确义利观的大情怀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直面国际交往中的利益平衡问题,体现了践行正确义利观的大情怀。习近平指出:“我们提出践行正确义利观,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4]450}正确义利观渊源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的义利观,传承了社会主义中国一贯的国际交往传统,反对见利忘义,“做到义利兼顾,讲信义、重情

义、扬正义、树道义”^{[5]200},反映了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交往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内核。一是强调大国示范责任。正确义利观离不开大国的率先垂范。习近平强调,大要有大的样子,大国在国际交往和全球治理中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在国际冲突的化解和协调中应该摆脱自身利益的羁绊,根据是非曲直站在国际正义的一边。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始终坚定站在维护人类良知和国际公理一边,积极在国际争端中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二是争取国际普遍认同。正确义利观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只有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正确义利观才能真正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价值观。在现行国际交往中,发展中国家整体处在弱势的地位,对正确义利观的呼声更强烈,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在国际上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是践行正确义利观的关键。习近平强调:“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大文章。”^{[5]540}三是强化国际道义行动。正确义利观只有落实在国际交往的行动中才有生命力。习近平强调要切实落实好正确义利观,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真正做到弘义融利。无论是在与非洲国家的长期交往中,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中,还是在支持世界各国共同抗击新冠疫情中,中国都在认真践行正确义利观,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帮助。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221.
- [2] 王存刚.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时俱进的品格及当下意义[J].欧洲研究,2018,36(3):103-116;7.
- [3] 钟明华,缪燧晶.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初探: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J].探索,2020(2):25-33.
- [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5]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2版.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8] 胡艳萍.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动因、制约因素及实现路径[J].学术界,2020(9):140-146.
- [9] 杨晔.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N].人民日报,2018-04-09(1).
- [10] 张辉.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法社会基础理论的当代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2018(5):43-68;205.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2.
- [12] 湛国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国际道义优势[N].光明日报,2018-06-01(2).
- [13] 门洪华.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中国方略[J].中国社会科学,2017(10):36-46.
-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
- [15] 刘润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4(4):18-20.
- [16] 王泽应.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意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4(4):5-14.
-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5.
- [18] [美]爱蒂丝·布朗·魏伊丝.公平地对待未来人类:国际法、共同遗产与世代间平衡[M].汪劲,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4.

The Innovative Implication of the thought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HU Shou-yong

(Hu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angsha 410003, China)

Abstract: The thought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s an important innovative achievemen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 glorious model of constructing Chinese theory, spreading Chinese voice, contributing Chinese wisdom and displaying Chinese morality. It has opened up a new realm of Marxism in theory, a new model of spreading the Chinese voice in discourse, a new way of perfecting global governance in practice, and a new advantage of international moral force in ethic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se creative implications is significant for a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Key words: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theoretical innovation; voic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morality; global governance

(本文编辑:刘衍永)